

# 中国中产阶层的公民参与

## ——基于城市社区调查的实证研究

王新松 张秀兰

**内容提要:**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公民参与的研究大多认为其政治参与度低于其他社会阶层,但很少有研究关注中产阶层对非政治类公民活动的参与。文章通过一项全国抽样调查,集中探讨城市中产阶层的公民参与状况。研究发现,中产阶层群体虽然不倾向于参与政治,但更倾向于参与非政治类公民活动。多元回归分析显示,中产阶层参与志愿服务的几率是其他社会阶层的1.248倍,该结果只在收入较低的中产阶层和在“体制内”单位工作的中产阶层中显著,“体制外”和更加富裕的中产阶层尚未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公民参与行为。

**关键词:** 中产阶层 公民参与 政治参与 社会参与 志愿行为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947(2016)01-0193-12

### 一、研究问题

随着中产阶层群体的扩大,对这一群体的公民参与态度和行为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李培林、张翼,2008;李春玲,2011;Goodman,2016)。西方对中产阶级的研究通常认为,中产阶级比社会下层有更高的公民参与意识,并通过参与行动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对中国中产阶层群体的价值观和行为具有相应的理论期待。然而,从目前的研究发现来看,不同类型中产阶层的政治价值观呈现多元化趋势(Tang, Woods & Zhao, 2009;李春玲,2011),且在政治参与行为上并不比其他社会阶层更积极(Chen & Lu, 2011)。

现有的对中产阶层公民参与的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参与方面,忽略了社会参与行为。公民参与既包括参与政治活动,如联系政府官员、参加选举活动等,也包括社会参与行为,例如为慈善组织捐款、加入社会组织、参加公益活动等,两者都体现出公民性,即对公共事

---

**作者简介:** 王新松,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张秀兰,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2014年度北京高校青年英才计划“快速城市化中的基层治理”(项目编号: YETP0276); 2014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公共服务信息化与国际经验整合”(项目编号: 105576GK)。

务的关注并通过集体行动来改善公共生活(王新松,2015)。一些研究显示,志愿服务等社会参与行为在我国发展迅速,参与群体不断扩大,并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张网成,2011;罗婧、王天夫,2012)。那么,中产阶级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产阶级的社会参与特征如何?如果说中产阶级在政治参与行为上比其他阶层更为保守,那么他们是否在非政治类的公民活动上表现得更为积极?目前的研究尚未回答此类问题。

此外,中产阶级内部并非统一整体,而是因决定性因素的不同而进一步分层,例如由职业类别的不同可以分为“老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前者泛指小雇主阶层,后者则包括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Goldthorpe,1987)。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有学者依据中产阶级职业与国家体制的关系,将其进一步划分,例如“公职新中产”和“市场新中产”等(刘欣、朱妍,2011),并且因其所处位置不同,各类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行为也存在差异。就社会参与行为而言,中产阶级内部的差异如何,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文通过一项全国社区抽样调查,观测中产阶级的社会参与行为特征,将之与其他社会群体进行比较,并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和职业类别的中产群体之间公民参与水平的差异,以及中产阶级的扩大对未来社会参与的影响和社会参与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 二、文献述评

公民参与是指公民参与到社会、社区等共同体的生活中,以便改善他人的境遇或是改变共同体的未来(Adler & Goggin,2005)。其中,“公民”部分体现在现代社会中的公民间具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能够相互帮助、尊重和信任,也体现在公民对公共而非私人事务的关心和投入。公民性是在“参与”的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对帕特南而言,无论是通过参加足球俱乐部、登山俱乐部参与公众生活,还是通过参加选举来参与政治,都是公民性的体现,也都能够促进社会资本的发育,并有助于改善社会治理的质量(Putnam,1993)。

有学者将公民参与划分为政治参与、社会参与和道德参与,其中社会参与是指对各种没有政治目的的民间生活中的组织、协会的参与(Berger,2009:342)。还有学者认为,社会参与——包括向慈善组织捐款、对垃圾进行回收利用、参加社会和社区公益活动等——是政治参与的前奏,是帮助我们分析和理解政治参与的社会条件,社会参与行为和社会资本也会逐渐转化为程度更高的政治参与价值观和行为(Ekman & Amnå,2012;Jeong,2013)。以上研究结论告诉我们,公民参与应该既包括政治参与也包括社会参与,两者相互影响。鉴于已有的研究多集中于政治参与,本研究把重点放在社会参与的部分。

影响公民参与行为的因素有哪些?影响路径是什么?中产阶级的身份是通过哪些路径影响公民参与行为的?下文将简要回顾公民参与的主要解释理论。

### (一) 理性选择理论

基于“理性人”的假设,参与行为是个体对成本与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以实现收益最大化为目标(Downs,1957)。理性的选择往往受个体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例如对城市中产阶级群体来说,房产是其阶层地位的象征,保护房产不受侵犯则关乎其最直接的利益,因此中产阶级群体会通过政治参与来保护自身的利益(Wang,2006;陈映芳,2006;刘欣、朱妍,2011)。此外,参与公民活动会产生机会成本,例如参加志愿活动可能意味着放

弃了时间用来开展有偿工作,因而收入越高的人可能越不倾向于参与志愿活动。但实证研究发现,这一理性选择的解释只适用于低收入人群,因为低收入人群更在乎因参加公益活动而失去有偿工作时间。富裕人群因为其社会经济地位而更在乎志愿活动所试图解决的问题,例如社区安全、环境问题等。参加公益活动对于富裕人群来说还具有“身份象征”的意义,这也促使他们为满足身份感而参与公民活动(Musick & Wilson, 2008)。

### (二) 资源理论

参与公民活动需要一定的条件和资源,例如时间、金钱、健康和公民技能等,具有这些资源的人更有可能参与公民活动(Brady, Verba & Schlozman, 1995)。有学者对城市中产阶级联合起来解决房产物业纠纷的研究发现,很多中产业主本身就职于政府或公共部门或与这些部门有联系,所以他们有更多的渠道获取政治社会资源(Cai, 2005)。中产业主的经济能力也使他们拥有更多解决问题的手段,例如聘请律师或是组织汽车游行,也更善于使用拍照、摄像等技术手段。此外,中产阶级因为收入更高而有更大的捐款能力,因为接受更多的教育,他们有更强的对社会问题的认知能力、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以及开展组织工作的能力等,这使得他们比社会下层群体有更多的资源来开展公民活动。但同时,虽然收入和教育水平更高的公民在一些方面具有更多的参与资源,但是他们可能因为缺少足够的时间而显示出比其他阶层更低的参与水平(Wilson, 2000)。

### (三) 社会心理理论

公民参与也可能受到个体社会心理条件的影响,包括价值观、功效感、参与认同等。中产群体的出现意味着社会中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变化,人们更加关注超越自身以外的公共事务,并更加愿意为谋求公共利益而做出个人努力,这表现为关心公共政策、参加政治活动、要求政府问责等(Verba, Schlozman & Brady, 1995)。然而,尽管城市中产阶级与社会下层群体相比,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更低、政府工作满意度更低、社会公平感更低(张翼, 2008),但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总体更为保守,表现为对参与理念的认同度更低、对竞争性选举的支持度更低,政治参与程度也更低(Tang, 2011)。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不仅仅体现在对政治活动的参与。中产群体更高的教育水平促使他们形成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并建立起帮助他人的自信,因此,中产阶级有可能出于各种原因较少参加政治活动,但更愿意通过志愿服务、捐款等行为来解决某项社会问题或是实现社会公平。

### (四) 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特征,包括信任、规范、网络,这些特征能够帮助公民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促使其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增进集体协作从而提高社会效率(Coleman, 1990)。通常认为,中产阶级群体更有能力充分利用社会资本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例如对美国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改革的研究显示,中产阶级的家长比工人阶级家长更倾向于形成人际网络,并通过集体协作来与校方谈判协商,以确保孩子的教育利益(Horvat, Weininger & Lareau, 2003)。目前对中国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公民的政治参与产生了正向影响(胡荣, 2008),但是尚未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判断中产阶层群体的社会资本与其他阶层相比的状况以及对参与行为的影响。

### (五) 动员理论

由于其它个人活动的竞争,例如休闲、家务等,公民即便拥有足够的资源、功效感、社会资本,也未必会参与公民活动。但如果受到来自外界的动员——包括政党、社会组织,或是亲戚、朋友——其参加公民活动而不是与之相竞争的其它活动的可能性会增加。例如对美国的公民捐款行为的研究表明,非裔美国人的捐款率低于白人,其中一个原因是募款组织向非裔美国人募款的可能性更低(Musick, Wilson & Bynum 2000)。

以上理论都反映出,中产阶层的社会、经济、心理特征决定了该群体具有更高的公民参与意识,表现出更高层次的参与行为。更进一步地,中产阶层内部根据社会经济条件还可以再分层,例如中国的中产阶层群体根据收入和职业划分为不同层次,并表现出政治态度和参与行为的差异。

基于公民参与的解释理论,我们有理由相信,收入越高的中产群体可能越注重社会的平等、正义及其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因此他们可能有更高的意愿参加公民活动来促进社会发展的平等。另外,从职业类型来看,“体制内”的单位更有可能承担起组织公益志愿活动的角色并且对职工有更强的动员能力。因此,组织渠道的低成本和单位动员的压力可能促使“体制内”的中产阶层群体参与公民活动,而“体制外”的中产群体则相对缺少公民参与的渠道,也更少面对组织动员的压力。下面将对以上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 三、研究设计

对公民参与的研究多采用量化方法,通过对符合科学抽样的大样本的测量,得出整体人群的参与特征。本研究使用一套城市居民公益行为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来研究中产阶层的公民参与,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第一阶段综合考虑了区域分布、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三个因素,共抽取27个城市;第二阶段在每个抽中的城市中抽取4个社区,分别为老旧小区、商品房社区、单位大院和保障房社区,调查最终覆盖全国27个城市、108个社区,包含有效样本5341户。问卷由经培训的社区工作者入户面访,内容涉及个人基本情况、工作状况、家庭收入与支出、公益行为与意愿等方面。

通过问卷调查我们测量了公民参与的变量及其可能的影响变量。本研究使用多元回归统计分析检验中产阶层群体的公民参与水平以及与其他阶层的参与水平相比较的结果。此外,鉴于中产阶层内部的分化和利益差异,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中产阶层在公民参与上的差异。下面具体介绍各变量及其测量方法。

### (一)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指的是社会类的公民参与,包括参加公益组织、参加志愿活动等。调查问卷中的如下问题被用来对该变量进行测量:“过去一年中,您是否参加过由公益机构、工作单位、社区、政府以及宗教团体等发起的志愿服务?”受访者给出的答案经过编码产生一个虚拟变量(1=是;0=否)。

### (二) 自变量

本研究所关注的影响公民参与的主要变量是公民所处的社会阶层——中产阶层。对中产阶层的测量包括自我认同和客观指标(收入、教育、职业等),鉴于调查数据所限,本

研究综合考虑职业、收入、教育三个客观要素来测量中产阶层。其中职业中产阶层包括党政机关负责人、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人员(教师、医生、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护士、厨师、工程技术人员等)、行政办事人员、私营企业业主、个体工商户业主、营销人员、自由职业者。其中营销人员和自由职业者虽然没有包括在传统上对职业中产的定义中,但是他们一方面区别于手工劳动者,另一方面随着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从业人员的数量、教育水平和收入也不断增长,因此本研究将它们也列为中产阶层。

为了探究职业中产阶层内部不同职业类型对其参与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将职业中产进一步分为“体制内”中产和“体制外”中产,前者包括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和集体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中产群体,而在所有其他类型单位(社会团体、中资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外资企业、个体经营等)的中产群体都被列为“体制外”中产。虽然整体而言,职业中产比非中产更有可能参与公民活动,但是不同类型职业中产阶层群体由于参与渠道、动员压力的不同,公民参与的程度也应有所不同,“体制内”中产预计比“体制外”中产的公民参与度更高。

对中产收入的界定,本研究采用了以样本收入平均值为基准的做法,将收入超过样本收入平均值(43935元)的户定义为中产收入户,并根据中产收入水平,又细分为初级中产(平均收入低于8万元)、中级中产(8~10万元)、副高级中产(10~20万元)以及高级中产(20~200万元)。最后,教育中产指的是教育水平在大专和大专以上的城市公民。

### (三) 控制变量

由于数据的局限性,模型中所能够控制的主要变量是社会资本,而社会心理、动员理论的变量以及资源理论中关于时间的变量无法控制。此外,模型中还控制了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党派、户口类型、居住社区类型等人口学变量和环境变量。

## 四、数据分析

### (一) 描述性分析

表1对影响参与行为的自变量——中产阶层以及控制变量的基本情况做了描述,其中连续变量列出了平均值和标准差,类型变量列出了某类型(括号中)的百分比。由于调查问卷中未包括退休人员的退休前职业,因此对于退休人员的中产阶层的测算,仅包括收入和教育水平两个维度,对于在职工作人员的中产阶层的测算,则包括收入、教育以及职业三个维度。由此,样本中包含的中产阶层群体占13.48%,该比例与其他研究的测算结果接近。其中如果单以收入作为衡量标准,收入中产占36.57%;如果单以教育作为衡量标准,教育中产占31.97%;如果单以职业作为衡量标准,则职业中产占10.71%。表1还列出了不同层次的收入中产和职业中产的分布情况,其中大部分中产群体的收入水平处在初级阶段,并且在体制内工作。

此外,样本的平均年龄为48岁,其中党员占24.92%,有宗教信仰的占11.30%。主要户籍类型为本市非农业户口,占87.11%。由于在抽样时对四种居住社区类型采取了等比例抽样,因此有效样本中四种社区类型的户数相当。社会资本变量通过测量样本户在遇到较大事情时可以寻求帮助的人数得出,样本户的社会资本平均值为2.58。

表 1: 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 N = 5320)

变量	频数	比例(%)	变量	频数	比例(%)
中产阶级	717	13.48	户口		
收入中产			本市非农业	4634	87.11
初级中产	435	60.67	外地非农业	249	4.68
中级中产	104	14.50	农业	437	8.21
副高级中产	154	21.48	居住社区类型		
高级中产	24	3.35	商品房社区	1347	25.32
职业中产			老旧社区	1340	25.19
体制内中产	432	60.25	单位社区	1345	25.28
体制外中产	136	18.97	保障房社区	1288	24.21
性别(男性)	2692	50.60		均值	标准差
宗教信仰(有)	601	11.30	社会资本	2.58	2.13
党派(共产党员)	1326	24.92	年龄	48.05	14.42

注: 对社会资本变量的测量通过如下问题获取 “如果您家遇到较大事情(急需一笔钱、孩子就业、家庭群体重病)需要帮助的时候,您家通常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为几个?”

从调查中得出,中产阶层中有 49.23% 的群体在过去一年参与过志愿活动,而非中产阶层中有 34.87% 参与过志愿活动,对中产和非中产样本的社会参与比例的 t 检验显示,两组样本具有显著差异( $p=0.000$ )。

中产阶层主要参加哪些公益志愿活动? 表 2 列出了问卷中包含的所有领域,中产的参与主要集中在环保、教育两个领域,救灾、助老助残等领域次之,对文化娱乐、扶贫、医疗卫生领域的参与则很少,此外,被访的中产者没有人表示参加过宗教领域的志愿服务。

表 2: 中国中产阶层群体参加志愿服务领域

	环保	教育	救灾	助老助残	文化娱乐	扶贫	医疗卫生	其它	不清楚	宗教	总计
频数	118	109	57	21	13	11	11	7	1	0	348
百分比	33.91	31.32	16.38	6.03	3.74	3.16	3.16	2.01	0.29	0	100

## (二) 统计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参与水平的差异,本研究用三个 logistic 模型对公民参与的行为进行分析。模型 1 的自变量是中产阶层身份,模型 2 和 3 分别对不同收入 and 不同职业类型中产群体的公民参与进行回归检验。在所有模型中,自变量的参照组为非中产阶层,控制变量中类别变量的参照组分别为:女性、无宗教信仰、非共产党员、本市非农业户口、单位社区。表 3 列出了检验结果,包括每个变量的系数、几率比(Odds Ratio)和标准误差。

表 3: 中国中产阶层的公民参与行为 Logistic 模型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	Exp ( B)	SE	B	Exp ( B)	SE	B	Exp( B)	SE
自变量									
中产阶层	0.221*	1.248	0.091						
收入中产									
初级中产				0.346**	1.414	0.111			
中级中产				0.412	1.510	0.215			
副高级中产				-0.244	0.783	0.187			
高级中产				-0.126	0.882	0.457			
职业中产									
体制内中产							0.295*	1.344	0.118
体制外中产							-0.188	0.829	0.194
控制变量									
性别	0.009	1.009	0.064	0.011	1.012	0.064	-0.080	0.923	0.085
年龄	-0.022***	0.979	0.002	-0.022***	0.979	0.002	0.004	1.004	0.005
宗教信仰	0.283**	1.327	0.100	0.281**	1.324	0.100	0.316*	1.372	0.139
党派	0.586***	1.796	0.075	0.572***	1.771	0.075	0.561***	1.752	0.095
社会资本	0.053***	1.055	0.015	0.055***	1.057	0.015	0.064***	1.066	0.018
户口									
外市非农业	-0.782***	0.457	0.164	-0.779***	0.459	0.164	-0.873***	0.418	0.209
农业	-0.774***	0.461	0.127	-0.776***	0.460	0.127	-0.664***	0.515	0.157
社区类型									
商品房社区	-0.314***	0.731	0.088	-0.302**	0.739	0.088	-0.245*	0.783	0.112
老旧社区	-0.257**	0.773	0.087	-0.259**	0.772	0.087	-0.168	0.846	0.116
保障房社区	-0.303**	0.739	0.090	-0.304**	0.738	0.090	-0.145	0.865	0.122
常数项	0.454**		0.142	0.447**		0.142	-0.442*		0.224
X <sup>2</sup>	273.66			283.37			139.95		
df	11			14			12		
p	0.000			0.000			0.000		
N	4662			4662			2548		

注: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从三个模型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本研究提出的三个假设得到了部分验证。模型 1 显示,中产阶层的身份与公民参与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中产阶层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几率(Odds)是非中产阶层群体的 1.248 倍( $p < 0.05$ )。这说明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更高的中产群体相较社会下层群体,对公益事业有更高的利益相关度,并且可能具有更高的公民责任感,对社会平等和正义更加关注,也可能有更多的可支配时间参加公益志愿活动。此外,在单独的检验中,中产阶层群体的社会资本值也显著高于非中产阶层,而社会资本对于公民参与的影响是显著的。

模型 2 显示,在不同层级的收入中产中,家庭年收入在 8 万元以下的初级中产阶层与

非中产阶层相比,更有可能参与公民活动,其结果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当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初级中产阶层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几率是非中产阶层的1.414倍。如果放松对统计结果显著的要求的话,家庭年收入在8~10万元的中级中产阶层群体的公民参与也在0.1的水平上显著( $p=0.055$ )。有趣的是,副高级中产和高级中产两个变量虽然不显著,但是系数均为负值,说明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元的中产阶层群体比非中产阶层参加公民活动的可能性更低,但是相关性不显著。

以上结果说明,中产阶层中的低收入群体比高收入群体更有可能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这一结果有几个可能的原因。

首先,正如对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态度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在中产阶层内部,收入更高的中产阶层群体对社会议题的兴趣也有可能低于收入更低的中产阶层。对于问卷中志愿服务所涉及的领域和议题,例如环境保护和教育等,高收入中产的选择更多。例如同样是面对公共议题可能对自身产生的不利影响,高收入中产可以选择参与公民活动来“呼吁”,也可以选择利用其更优越的资源来“退出”(赫希曼 2001),例如选择搬到更高档的社区居住、将子女送到更好的学校等。但对低收入中产来说,“退出”成本过高,而“呼吁”是更为现实的选项,这有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低收入中产比高收入中产更有可能参与志愿服务。

其次,更高收入的中产群体参加公民活动的机会成本高于低收入中产群体。从年龄上来看,除了高级收入中产以外,其他各级收入中产所处的年龄相近(42~44岁),因此可能面临相似的家庭负担(照料子女、老人等),但对高收入中产来说,花费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参加公民活动所丧失的机会收益要高于低收入中产,因而更不倾向于参与志愿活动。

模型3显示,从就业单位类型来看,在体制内工作的中产阶层群体比非中产阶层群体参与公民活动的可能性高。当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体制内中产的参与几率是非中产的1.344倍,该结果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体制外中产与公民参与的相关性虽然不显著,但是系数为负数。体制内中产和体制外中产的社会参与程度的差异有四种可能的解释。

第一,体制内中产比体制外中产阶层群体对社会公共议题的认知度更高。我国的社会公共事务一直以来主要由体制内力量承担,尽管国家强调“社会化”的作用,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服务,但是“强国家”的特征并没有改变。这一方面使得在体制内工作的人员比体制外人员接触公共事务的机会更多、了解更多,因此参与社会事务的愿望更强;另一方面造成社会对政府的依赖度过高,对于部分体制外人员来说,“有问题找政府”是一个较为普遍的想法,通过自我参与、自我组织去应对社会议题仍未成为主流。

第二,目前仍有很多公益志愿活动,例如捐款、扶贫、爱老爱幼、植树等,是由单位组织员工参加,或是由单位所在行政辖区主办但邀请单位派员工参加。本研究的数据也显示,居住在单位型社区的中产阶层参与公益活动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居住在其他类型社区的中产阶层。相比体制外的中产,对公共议题感兴趣的体制内中产阶层群体有更多的机会,且可以更方便地参加到志愿服务中。换句话说,体制内中产的参与成本更低。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逐步普及,越来越多的体制外部门开始重视企业对解决社会问题的贡献,组织员工开展公益活动,甚至建立相关部门致力于企业社会责任,但是总体来讲在目前的阶



段,体制外的中产阶级仍然缺少体制内单位组织参与志愿活动的机会,需要自己主动寻找公民参与的渠道,因此他们的参与成本更高,这有可能降低他们的参与度。

第三,体制内单位对于员工参加单位组织的公益志愿活动有更强的动员能力。这种动员能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单位”自身对员工的压力,例如对体制内员工的考核中,“社会服务”一项包括了员工平时对单位组织的各项活动(包括志愿活动)的参与度。尽管社会服务在考核中所占比重较小,但是有的员工会担心不参加活动有可能被单位解读为不支持领导工作、自由散漫等,甚至也可能被解读为对体制的不支持,而这一点在对员工的考核和升迁考察中可能起到一定的影响。不排除员工为了显示自身对体制的支持并获得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潜在资本,而选择参与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来自同僚的压力,如果别人都参加单位组织的志愿活动,自身的退出则有可能造成更不利的后果。相比之下,私营部门对员工在工作业绩之外的要求要少于体制内单位,员工面对单位的动员压力更小,参与的“志愿”性更强一些。

第四,有一些公益参与行为并非主观意愿所驱使,一些体制内单位出现了员工在没有明确主观意愿甚至是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某项志愿活动的情况,例如媒体报道过的“被志愿”的现象,有的单位甚至直接从员工工资里扣除为某项活动的捐款等。这种情况虽为少数,但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体制内中产群体的参与度高于体制外中产的实证发现。

三个模型中对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示,性别与公民参与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在模型1、2中,年龄越大的被访者参与公民活动的可能性越小。另外,三个模型都显示党员和有宗教信仰的人比非党员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参与公民活动的可能性大,对党员参与度高的解释和对体制内中产阶级群体参与度高的解释类似。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身为党员而政治觉悟更高,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度更高,责任感更强;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的党员都在体制内工作,所以他们有可能因为面对体制的动员压力而参加公民活动。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的关系非常显著( $p < 0.001$ ),验证了公民参与的社会资本理论。外地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的被访者都比本地户口的被访者参加公民活动的可能性低。最后,单位型社区的被访者参加公民活动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社区的被访者。

##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一项全国抽样调查观测中国城市居民的公益行为,从而集中探讨中产阶级群体对社会类公民活动的参与情况。研究发现,按照收入、教育、职业三个指标划分,城市中产阶级的比例占城市中18岁以上居民的约13%,其中约49%的中产阶级群体在过去一年中曾参与过志愿活动。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其他变量(人口学变量、社会资本、户口、社区类型等)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中产阶级群体的公民参与几率是其他社会阶层群体的1.248倍,然而,体制外的中产阶级和更加富裕的中产阶级尚未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公民参与特征。

这一结论意味着中产阶级对社会公益事业有更强烈的兴趣,并且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持他们的参与。同时,该结论也是对现有的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的一个补充,大多数的研究认为中产阶级的政治价值观偏向保守,政治参与水平低于其他社会阶层,而本研究显

示,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不倾向于参与政治,但更倾向于参与社会公益、志愿服务等非政治类公民活动。中产阶级对公民参与的差异选择可能受到了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我国目前仍在稳步建设政治参与的有关制度,一方面充分发挥既有的政治参与平台,包括人大、政协,另一方面鼓励和建设新型参与机制,包括听证会、社区议事会等。但总体而言,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度的提升,有赖于更为有效、制度化、低成本的政治参与途径的存在。与之相比,近年来兴起的公益热、在各个领域快速发展的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等,都为中产阶级的社会参与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更低成本的参与途径,这为一部分对公共事务感兴趣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中产阶级群体参与非政治类的社会活动提供了机会。从这一角度来看,对中产阶级来说,社会参与是政治参与的替代品。

第二,中产阶级群体相对来讲具有更高的公民参与意愿、更关注社会议题,但中产阶级的意愿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他们不希望参与的结果导致自身的利益受损(Bellin, 2000)。例如对政治参与的推动可能使人数众多的社会下层群体掌握更多的政治话语权,从而损害自身现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出于这样的担忧,中产阶级不会选择政治参与(Osberg 2013)。相对而言,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既满足了公民参与的意愿,又对自身的地位没有负面影响。因此,社会参与不是政治参与的替代品,而是中产阶级的更优选择。

第三,参与社会类公民活动非但不会影响中产阶级的自身地位,反而可能成为他们维持甚至增强自身地位的机会。对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的研究认为,因为中产阶级对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具有更强的依赖性,与该结构的利益攸关度更高,因而通过政治参与实现政治目的的需求更低。本研究所发现的体制内中产阶级群体比体制外中产更积极参与志愿活动,既可能是被动员的结果,也体现出他们对体制的依存和自身利益的保护。

本研究的发现对未来中产阶级的公民参与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第一,尽管高收入中产阶级没有表现出更积极的公民参与特征,但是在所有的中产阶级群体中,低收入中产占大部分(61%),因此低收入中产的参与特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产阶级的总体行为趋势。同时,随着非中产步入初级中产阶级,社会参与也将成为中产群体的一个主要特征,而中产群体的公民参与行为也会带动其他社会阶层的参与行为。

第二,相类似的,尽管现阶段体制内中产阶级群体的社会参与度比体制外更高,但是随着社会组织的发育、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进,体制外中产阶级社会参与的成本也在降低。事实上,在一些省份和地区,体制外的志愿活动、社会组织发展迅猛,政府相关部门试图通过改革管理制度,为这些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从而与体制内所推动的公民参与活动相结合,或是补充体制内的社会服务。

第三,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的关系值得进一步讨论。本研究显示出,我国中产阶级的社会参与受政府的影响较大。公民参与的理论告诉我们,公民参与行为将带动社会资本的增长,包括公民间更广泛的社会网络、更高程度的信任以及对社会规范的认同,这是一个公民文化建构的过程,这些因素也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政府的治理。那么,我国目前由政府带动的社会参与模式是否会如理论所预示的那样产生社会资本、推动公民文化建设,并进一步促进政治参与行为,需要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探索。

## 参考文献:

- 陈映芳 2011 “行动力与制度限制: 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级”, 《社会学研究》2006 4。
- 胡荣 2008 “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 《社会学研究》2008 5。
- 李培林、张翼 2008 “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 《社会》2008, 2。
- 罗婧、王天夫 2012 “何以肩负使命: 志愿行为的持续性研究——以大学生支教项目为例”, 《社会学研究》2012 5。
- 王新松 2015 “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及社会参与: 概念辨析与理论解读”, 《浙江学刊》2015, 1。
- 张网成 2011 《中国公民志愿行为研究——现状、特点及政策启示》,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 张翼 2008 “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2008 2。
- [美]阿尔伯特·赫希曼 2001 《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 卢昌崇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 Adler, R. P. & J. Goggin, 2005. “What Do We Mean by ‘Civic Engagement’?” *Journal of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3(3): 236 – 53.
- Bellin, E., 2000. “Contingent Democrats: Industrialists, Labo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e –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Politics*. 52(2): 175 – 205.
- Berger, B., 2009. “Political Theory,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End of Civic Engagemen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7(2): 335 – 50.
- Brady, H. E., S. Verba & K. L. Schlozman, 1995. “Beyond SES: A Resource Model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2): 271 – 94.
- Cai, Y., 2005. “China’s Moderate Middle Class: The Case of Homeowners’ Resistance.” *Asian Survey*. 45(5): 777 – 99.
- Chen, J. & C. Lu, 2006. “Does China’s Middle Class Think and Act Democratically?”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1(2): 1 – 20.
- 2011.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The Middle Class’s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4(3): 705 – 19.
- Coleman, J.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owns, A.,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Ekman, J. & E. Amnå, 2012.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Civic Engagement: Towards A New Typology.” *Human Affairs*. 22(3): 283 – 300.
- Goldthorpe, John H., 1987.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Goodman, D. S. G., 2016. “Locating China’s Middle Classes: Soci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 Party – stat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97): 1 – 13.
- Horvat, E. M., E. B. Weininger & A. Lareau, 2003. “From Social Ties to Social Capital: Class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chools and Parent Networks.”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40(2): 319 – 51.
- Jeong, Hoiok, 2013. “From Civic Participation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4(4): 1138 – 58.
- Musick, M. A., J. Wilson & W. B. Bynum, 2000. “Race and Formal Volunteering: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Class and Religion.” *Social Forces*. 78(4): 1539 – 70.

- Musick, M. A. & J. Wilson, 2008. *Volunteers: A Social Profil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Osburg, J., 2013. *Anxious Wealth: Money and Morality among China's New Rich*.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ang, M., D. Woods & J. Zhao, 2009. "The Attitudes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towards Democracy."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4(1): 81-95.
- Tang, M., 2011. "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6(4): 373-87.
- Verba, S., K. L. Schlozman & H. Brady,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X., 2006. "Rights Consciousness,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he 2003 District-level People's Congress Elections in China: Middle Class Motivations and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In Yang Zhong & Shiping Hua, eds.,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Hackensack: World Scientific.
- Wilson, J., 2000. "Volunteering."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215-40.

## Civic Engagement of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an Urban Community Survey

Wang Xinsong & Zhang Xiulan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Most research on civic engagement among China's middle class has found out that they are less politically active than other classes. Very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focused on the middle class's non-political civic activities. This study uses a nationwide survey to examine volunteering behavior of urban residents, which is meant to study the urban middle clas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activities.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although middle class members may not be interested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y are inclined to engage in social participation. A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shows that the odds of participation by middle class members in volunteering activities is 1.248 times that of members of other classes, although the association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only among the lower-income middle class households and among the middle class members employed within the state system, while those employed outside the state system and the wealthier middle class members have yet to demonstrate more active civic engagement.

**Key words:** Middle Class; Civic Engagemen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ocial Participation; Volunteering Behavior

(责任编辑:刘承礼)